

【历史研究】

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

余劲东

摘 要: 明代京察访单是服务于在京文官考察的文本,于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科道官,令其在博采众闻后填写与应察官员相关的见闻,并作为官员处置依据,以期增强京察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其制作、发放、回收有整套严密程序,并在回收后,令基层科道官员针对回收访单进行会单,从而提出应考官员去留的基本意见,以凭主管京察官员终裁处罚轻重。京察访单的实质是科道官行政监督权的体现,让多部门参与其中,并让基层官员处理具体事务而让高级官员总揽其成,体现了明代政府运行中各部门相互制衡的特点。

关键词: 访单; 明代京察; 考语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5)02-0130-07

京察,又称内计、内察,是明代针对南、北两京文官定期考察的政治制度。虽然带有京察性质的京官考课在明代前期已经断断续续的有所举行,但直至弘治年间明朝才正式确立“六年一察”的京官考察制度,并一直沿用至明亡。明人目京察为“官尽百司,时经六载”^①的大事,自然会进行长期而充分的准备,京察访单便是京察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明代京察中针对四品以上大员和五品以下文官有不同的考察方式,而访单专针对五品以下官而言。这类官员虽品级较低,却因数量巨大而构成在京文官的主体。

所谓访单,是朝廷进行重大决策前发给相应官员征询意见的一种带有档案性质的文书,其目的是广泛收集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科学合理。而京察访单则是为保证京察公正而在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言官并令其填注所知官员事迹的文书。明代京官考察这一议题虽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但研究的对象却主要集中于京察制度形成、演变与评价,对这一制度运行中的相关细节的研究则并不深入,京察访单即是一例。作为京察准备阶段的重要一环,王天有仅用寥寥数字便对其进行概括^②,虽然所言无误,但却

不足以表现访单之全貌。张显清、林金树认为“访单并非非用不可的法定程序”“访单不如考语作用大”。^③这种观点又不尽准确。访单使用并非源于政府法令规定,不是法定程序固然无误,但访单却在京察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中屡次被采用,成为一种虽不载于官方典册却屡次施行的“潜规则”,访单与考语并列为京察中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作用孰大孰小似不可一概而论。

因京察访单并非定之令甲,故在官方政书当中难于发现访单的详细信息;且因访单带有档案性质而有较高的保密要求,至今仍难得见明代访单实体,但这一文本又确实在明代有所使用,毕竟当时的吏部官员与科道言官屡屡提及此物。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因与朝中党争颇有联系,以致当朝不少官员将自身被黜退归因于访单不公,进而引发出来月不休的争议并留下大量奏疏,其中屡有关于访单的议论,这为研究京察访单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主要以万历三十九年京察的相关奏疏和在万历前后任职吏部或都察院并参与京察官员文集的记载为主要资料来源,对出京察访单使用与作用的轮廓作一简单勾勒,以见较为宏观的京官考察制度在具

收稿日期: 2014-07-02

作者简介: 余劲东,男,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博士生(香港 999077)。

体运行时的微观面相。

一、京察访单的基本特点

如前所述,京察访单是在政治运行中成型的信息收集方式而非定自法令的制度,因此其形成与发展的若干细节便稍显模糊。万历二十一年适逢京察之年,因明廷在政治运行中形成了“京察届期,台省例有陈言”^④的惯例,万历二十年给事中吴鸿功在例行陈言中就京察访册中不列吏部四司属员之名提出质疑,希望吏部有所更正。时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并实负次年京察之责的赵南星对此回复如次:

查得访册之事,原非定自令甲,顾部中相传,则已久矣。往岁京察年份,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将六年内应考察官员,亲自书写职名单,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为咨访,回报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访单意也。隆庆以后,乃有刻版访册,以便博访,然亦止送科、道首事二臣,复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与之,听其转送,此今日版册之所繇始也。以非定自令甲,故虽访单之始,亦无从察其为何年。今刊刻遍送,意则公矣。^⑤

赵的复疏涵盖了京察访单的不少重要信息。其一,访单并非明廷京察的法定程序,而是吏部为彰显京察公正而行的权宜之计;经过发展,访单逐渐完备为访册,但访册不过是将多张访单汇成一册并刻版发放,与访单的差别在量而不在质,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明人著述中,常将访单、访册混用。其二,访单出现的确切时间已难查考,赵南星认为当在隆庆之前;而据明人传记所载:周津“弘治庚戌转南京监察御史,会内察,悉心咨访”^⑥。可见至迟在弘治年间,便已有京察咨访的记录;而咨访的实物载体访单,当在此时便已有雏形。其三,访单囊括“六年内应考官员”职名,而明廷规定“六年内应考官员”范围不仅包括在任官员,还包括“带俸,公差,丁忧,养病,侍亲,即行查未报,并上年正月以后升任及六年之内未经考察等项官员”^⑦。可见访单开载非常全面,几乎难有漏察之人。

二、访单的发放与回收

虽然赵南星认为迟至隆庆时才出现刻版访册,但至万历时访册却已成为京察中的“旧规”,是故万历乃至明末的屡次京察几乎都能发现使用访册的记

录。访册的制作需经过编纂、刻版、装订三个步骤,皆由吏部委官完成。首先,访册的编纂如上引文所述,由“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将六年内应考察官员亲自书写职名,送科道刻版访册”^⑧;而吴鸿功称:“臣初接访册之时,首阅之,无吏部四司;终阅之,又无吏部四司,臣私自意曰:此不过装订者一时偶遗。”^⑨因访册由吏部刻版并委官发放,可以推知吴鸿功所言的装订者,也属吏部官员。

访册制作成型后由吏部委官发送,“十月以前,所送科、道刻版访册,系司官自送,不列司官之名;十月中,送阁臣、都察院堂上官大访册,系堂官所送,始列四司之名”^⑩。可见根据接收对象的不同,发送访册的时间、官员品级和内容都会有些许差异:吏科都给事中与掌河南道御史在京察中承担的责任较重,因此送单较早,送单人的品级也仅为正五品的考功郎中,且二人所收访单并不全面;而阁臣行使皇帝的秘书职能,都御史通常和吏部尚书共同主管京察,因此他们的访册由吏部堂官送达,且更为全面,因阁臣、都御史无需注考,所以转送的时间也相对较迟。

因吏科都给事中和掌河南道御史是佐理京察的首要基层科道官,理应对其他科臣、道臣的在职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在接到吏部送达的访册后,还需向考功司官员说明当前有多少在京科道官。为避免作弊,考功司郎中仅根据二臣开报的官员人数发放足额访单,即赵南星所言“复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与之。”此后二臣便分头发放给科臣、道臣,如万历三十九年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称“臣谨循职掌,与(掌)河南道汤兆京分发访单,遍行咨问。”^⑪当事人汤兆京亦言“臣夙夜发访,固遵成法。”^⑫可见一旦接收到访单,便须立即发放给相应科道官,不得怠慢。因吏部是主管京察的部门,吏部四司虽非言官亦皆有填单之责。赵南星任考功郎时称“臣等至愚,叨管京察之事,竭力咨访。”^⑬周宗建亦言“内计六年一举,典至重大,即我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宪臣;即冢臣、宪臣亦不得自主,而参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众。”^⑭不仅表露出咨访的对象为谁,也透漏出主管京察的层层官员为何。

访单发放后的主要工作皆由河南道接手,汤兆京作为时任掌河南道都御史,称“一切咨访、收单、会单俱臣职掌。”^⑮突显了河南道的职能所在。访单

发送到言官手中后,咨访随即开始。为保证广咨博访,科道官填写访单,可凭目见、风闻,也可向相关官员暗中询问。如汤兆京称“臣所备(金明时)单,原止贪险有病,私通贿赂八字”^⑩,有病自然无可隐瞒,为目见之事;然私通贿赂,汤则自述来自风闻。但无论讯息来自于目见、风闻或是咨问,填单时必须指出细节以便核实。如万历三十九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向皇帝上奏御史金明时的访单详情时称“及查访单,有言其受总兵则几千者;有言其受参(将)、游(击)谢以几百计者。”^⑪虽然相关讯息来源不得而知,但根据言官填注的内容不难发现指事直书的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咨访结束后,言官便结合自己风闻或亲见的內容填写访单。但有关访单的填写,掌察主官与填单言官却一直存在矛盾。一方面,由于六年之内应考人数众多,导致“当事者每以见闻难周,其势不得不资于廉访”^⑫,掌察官员很大程度上需通过参看访单来决定人员黜陟,故希望接收访单的官员尽量详细地填写访单,以便考察顺利进行。而另一方面,因担心匿名填写访单造成诬告,明廷屡次申饬实名填注访单,且明文规定“见(匿名访单)者即便烧毁,被言者不坐”^⑬,但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虽然“访单秘密,难以家喻户晓”^⑭,但能够看到上缴之后访单的官员仍为数不少,众人口耳相传,很可能落入被评之人耳中。因之不少言官因担心访单填写的内容被人知晓、误犯权贵致使自己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而畏于任事,故以种种借口来逃避填写访单。针对此种矛盾,明人屡有陈言,如汤兆京便建议“在差者不得以道远鲜问为口实,略拨糠粃;待命者已经有外计与闻之往例,难容推避。”^⑮然这种理想化的建言,却难以阻挡同僚间的情牵面熟,访单实际效果仍不理想:有上交空白访册的官员,亦有官员以毫不知情为推脱而不交访单,这显然不利于访单发挥预期作用。时臣徐兆魁言“夫每一单,而必推求出自何人之手,则谁敢具。”^⑯说出了不少言官不愿填单的心理动因。即使对言官来说,这种消极应对也并非一劳永逸之举,虽然不填访单避免得罪同僚,但也很可能造成因未履职守而被追论,如(嘉靖)九年大计京官,河南道职专咨访,而御史陈王道一无所报(刘)斯洁劾罢之”,掌河南道御史陈王道显然就是因未尽职守而被黜陟。

有鉴于此,匿名访单便成为科道官门反复衡量

之后采用的折衷方式,如此则既忠于职事,又不至影响自己的人际关系。但匿名访单的缺憾也很明显,“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⑰,官员固然可以直抒见闻,也可以肆意行私,本来掌察者已经面临极重的负担,若再受匿名访单的干扰,更易心力交瘁。因此匿名访单实际上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官员利益的行为。这也不难理解为何明廷对匿名访单屡次明令禁止,且规定“见(匿名访单)者即便烧毁,被言者不坐”。但即便如此,匿名访单问题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

发单、填单之后,便可收单。万历三十九年“计典发单在十月,收单在十二月”^⑱,而较早的万历二十年吴鸿功同样称“阅月收单”,可见访单的填写时间通常约两个月;为了避免官员零散交单给都察院工作造成困扰,也会规定于十二月某日“约期收单”^⑲,以便统一步调。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间隔,目的是使言官有足够时间处理咨访事宜,从而保证填单时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三、访单的使用——会单

通常明政府两京五品以下官员人数约千余人,而考察时间却仅有一天。以一天时间应对千人考察,显然非常困难,所以准备工作都在事先完成。而在皇帝钦定的京察日期,仅止安排“过堂”一事。所谓“过堂”,是在京察当日,所有在京应考官员齐聚吏部,轮流到吏部公堂当场听候自己的考察结果并作简单行礼,即便出部。吏部在当日宣布结果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结合回收访单而进行的会单。

会单,是将之前所收的京察访单拿出,由吏部考功司郎中、掌河南道御史及吏科都给事中三人(若访单量大,则间或有都御史特派御史一人参与)会同查看、商议,进而提出被考官员去留的初步意见。以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为例,当年科道会单前后共三次。第一次是在收到访单之后汤兆京会同协理御史乔允升,“衙门收单后即往城隍庙拆封同阅,每封编一字号”^⑳,而后一并送往堂官处存放。编写字号的目的是证实此访单为本衙门按期所收,防止收单日期截止后仍有私单送进;而之所以选择在城隍庙拆封,既是为了避人耳目,也是取神明在上、不敢欺罔之意。第二、三次科道会单通常在京察前数日进行,如万历三十九年钦定三月二日京察,汤兆京称“二月二十五日会单(臣)与科臣、考功已共注处;二十

八日次会,复商订不移。”^{②7}所指便是后两次会单。其具体做法是将访单放置于一桌之上,而后由佐察之臣共同查看,所谓“四人拱对,八目阅单”^{②8},以显示公正和郑重。若在会单之时对访单填注的结果存疑,三臣还可向相关官员进行询问,如万历四十五年徐绍吉称“臣以吏科与其事,发单咨访,见(王)之案事迹累累,赃私狼藉,臣因往问刑部尚书李銑,答云:此人极是贪横;又往问吏部尚书郑继之,答云:此人官本不职。”^{②9}在对王之案处理意见不一时,吏科既询问王的堂官,又询问吏部尚书,可见会单时并不单纯看取访单填注情况,还应在可能情况下尽量核实。而之所以要反复会单,乃因吏部尚书和都御史分别主管全国的人事和监察,而京察即使重要也不过是其众多职能中的一项。二臣难有心力周知相关事宜,因此有必要令基层官员通过会单的方式得出初步处理意见,从而减轻工作负担;同时也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以期保证考察结果的合理性。

针对科道会单结果而进行的最终裁定,通常安排在京察前一日。因保密需要,吏部官员通常在京察前几日便分别住宿在吏部内,都察院都御史虽同样是主管京察的官员,但毕竟衙门不同,故仅在京察前一日赴吏部住宿以便主察,而都御史的宿部,则正好便利了掌察官员的会同裁定。能够参与终裁的皆为主察大员,如万历三十九年终裁参与者共五人,实与其事的吏部侍郎王图称其为“十目十手,指视昭然”^{③0},可见其严肃性。除王图外,另四人分别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弘纲。考功司郎中王宗贤因参与科道会单而对相关状况多有了解,故也需加入终裁以便介绍或答疑。许弘纲自述访单事,“比太宰出一折于袖中,已注不谨矣,臣等四人商确移时,始改浮躁”,除孙丕扬外还有“臣等四人”,也可印证参与终裁的人数状况与王图所言相同。

“河南道惟专咨访,采公论,评定去留;酌轻重则部院堂上老先生任也。”^{③1}大体说出了科道会单和部院终裁的本质区别。经过评定去留和斟酌轻重这两套手续,官员处置便已敲定,并将在次日过堂时公布。终裁之时,部院大臣可以有所轻重损益,对部分争议较大的官员进行商酌或是对力大援多之人予以调护,前引许弘纲之言即可印证:经过商讨,将金明时的处分由不谨改为浮躁,相应的处分便减轻不少。但一般而言,因京察被目为“天鉴在上,清议在下,

国法在前,青史在后”^{③2}之要事,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部院大臣通常不会冒险对科道会单结果做太大改变,诚如汤兆京所言“倘单开有据,咨访相同,即部院不敢枉纵人。”^{③3}

过堂宣判后,部院大臣会连夜赶造京察结果文书,呈皇帝御批,访单至此基本使用完毕。但为避免日后拾遗时无据可依,访单并不立即销毁,而是送吏部存档。访单一经封存便不可随意取出,万历三十九年因部分官员考察结果存在争议,汤兆京请求万历帝“敕下九卿会议,指名出单”^{③4},不难想见取出访单的困难程度,而之所以如此,或是出于保护填单言官免遭报复的考虑。

四、访单的互动机制——考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访单于京察中的作用巨大,万历中期吏部尚书陆光祖所指出的“今部院所据以考察者有二:曰考语、曰咨访”^{③5},并不夸张。但是讨论访单时,必须对其互动机制——考语,予以同样的注意。因为二者乃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所谓考语,是每逢京察年份,由各堂上官对属员书写的评价。科道通过咨访而来的讯息,可能有失偏颇或不够全面;而同在一个部门工作,堂官对属员的了解往往比较深刻,只要堂官愿意如实对属员进行评价,其可靠程度是远超咨访的。明代考语使用由来已久,起初主要用于针对外官的“三年大计”,其使用令官员评判更加客观,“外官之考斥者,十常得其八九,何也,有所凭据(考语)故耳”^{③6}。因之这一经验也推广到京察,《大明会典》载“隆庆元年议准,先期三月,吏部并南京吏部,咨劄各衙门堂上、掌印官,将所属但在应考数内者,查取考语,务要或贤或否明注实迹,类送部院,以凭面议酌取。”^{③7}虽不确定隆庆之前考语在京察中的使用情况,但可以肯定至隆庆时京察考语已成定制。

与在京科道言官人手一本访册,且可以消极抵制访册不同,考语以衙门为单位并必须按期上缴,绝难轻忽。每逢京察届期之际,明廷要求各衙门堂官将属下情况“或贤或否,务要明注实迹”,并纂造揭帖呈送部院。此外,“注考之后,或别有闻见,临时与部院面订,不妨异同”^{③8},可见考语呈报与补充机制之完善。相对于由基层官员任事的科道会单,考语可直接与部院大臣面订,可见其规格之高,但因某

些现实因素影响,本当在京察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考语却经常难以达到预期效用。各堂官虽然与僚属朝夕相处故所见颇真,但因京察直接关系到官员政治前途,长期被时臣目为“任怨”之事,一些堂官因害怕担怨而不从实注考,而是一概给予好评。明廷虽屡次申饬考语当从实填注,但堂官依然“开报考语,多标榜溢美之词”,导致时人认为“贤否之揭帖,只为市恩者之圣书。”^③可见考语效用某些时候实在难尽人意。正因为考语的种种不足,咨访的重要性才格外凸显。万历时都御史温纯欲乞求退,万历帝以“考察咨访,势期迫近,卿屡疏求退”^④,对其进行诘责,可见访单虽非定自令甲,但其效用却毫不逊色。

考语和访单,都是通过广咨博访的手段来实现维护考察公正的目的,而访单实际上也确实某些时候弥补了考语的缺位。如万历二十一年京察,“虞淳熙等三人,吏、兵二部司属,而访单有议,科道据以纠拾”^⑤,即是在考语不注差评的情况下用访单进行补充的案例。咨访与考语很难分清孰优孰劣:咨访委之与举报人并无太多交集的言官,理当较为客观,但“咨访诸臣,平时漫不加意,时至事迫,道听一言,信若符契”^⑥,准确性却不能保证;考语委之堂官,“夫庶官之贤否,惟各衙门之亲辖者知之为最真”^⑦,准确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在实际操作中,某些堂官为图省事,“每寄耳目于所属,为人所误而还以自误”^⑧,更有甚者竟“以考语密达被访之有司,彼此交通,互为耳目”^⑨,因此考语的客观性相对缺失。

考语和访单通常交互使用。万历时都御史陈有年云:“维时(吏部)尚书温纯、侍郎邓以瓚与臣及金都御史朱鸿谟相与,查据考语,参以体访,从公评陟,拟议去留。”^⑩此处所论“维时”,结合参与者的履职情况来看,当是部院大员的终裁,此时据以考语,参以体访,是强调考语的全面性。而在某人被拾遗论劾时,“臣据河南道报,无访单;及查南京工部考语,无贬词”^⑪,先访单而后考语,则是因拾遗针对性较强,而针对性正是访单所长。可见何时以访单为主、何时以考语为本,是根据行政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不可一概而论。

总而言之,考语与咨访是互为补充的。因考语开列得非常详尽,将本部所有应考官都纳入其中,因此其全面性远胜咨访;但是咨访针对某些劣迹斑斑的官员指名书事,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反而比密密麻麻罗列官员职名的考语揭帖更能引起主察官员的注

意。两者相互配合,共同保证了京察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五、政治运行中的访单

在进行过以上论述后,不难发现京察访单在京察各环节所发挥的作用,以万历三十九年京察为例:在京察准备阶段,访单的作用是博采众闻,如当年曹于汴和汤北京都宣传自己“遍行咨问”,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在朝官员的不法事迹,以便处置;而在“咨问”结束之后,会通过反复会单来讨论官员的去留情况;如当年的会单便进行了三次,还选择在城隍庙举行,不难想见其郑重;科道会单决定出任职人员后,由吏部和都察院堂上官来决定处分轻重,但部院的终裁也不敢马虎,如当年为金明时一人的访单,便商确移时,这其实代表了对言官行政监督权的尊重;而在当年处分有争议的时候,吏部尚书和言官等人都要求“指名出单”以便核实,可见其时无人敢视访单为儿戏。

但访单的缺憾也很明显:虽然发放访单的初衷是尽量保证考察公正,然其填写的内容却常靠风闻而来,这就容易导致“科道风闻而弹劾,因以不真;铨曹误听而黜陟,因以欠当”^⑫的情况出现。万历三十九年京察时,便因官员风闻填单为被黜之人提供了咨访不公的口实;同时,匿名填写访单屡禁不止,甚至拒不交纳访单,如当年御史乔海石便自述将“封册不与兹事”,这极大限制了访单作用的发挥。此外,“京官之有访单者凡数百人,据所闻开列,人人宜黜”^⑬,访单数量巨大,虽保证了考察公正,却以某种程度的效率牺牲为代价。明人实已发现以上诸多弊端,且建议“京察年份,不必分单咨访,许部院各寺纠覆各属,以备考察”^⑭。但正如赵南星论及访单时所言:“事未善也,然继之者亦不敢改,恐人之议其私也,今遂为行私之政矣,盖作法之难如此。”^⑮任事者往往因害怕承担责任不敢对弊政有所更张,故终明之世,访单之弊亦未获得妥善解决。

回顾京察访单,我们不难发现他和不少制度一样,是在政治互动中产生并不断完善的。因考语的缺位,访单应运而生;因京官人数本身较多,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僚机构日益扩大,访单又发展成为访册。更为重要的是,访单其实行使着双重职能,一是与考语进行互动,令言官行使对堂官的监督,使高级官员的行政行为置于低级官员的行政监督之下;一

是通过基层官员进行会单拟定去留,而高级官员决定处分轻重,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腐化现象,而这正是明代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中“大小相制、上下相维”^⑤的一个缩影。

从京察访单中,我们也能发现明代政治制度设立的途径问题。洪武时期朱元璋在订立政治制度时,通常是利用自身权威来强制推行的。而在政治运行中,又会不断暴露出新的问题,制度也随之不断调整。朱元璋时期,因官员更替迅速,对处于辇毂之下的京官易于监控,因之定期考课的需求并不强烈。而随着承平日久,官员久任,考课京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才有了京察制度的出现。因京察制度针对的主要是中央官员,而中央官员往往不像地方官员那样有实际政绩可在短期内有效衡量,因之京察制度是缺乏经验借鉴的,所以只能在针对地方文官的“三年大计”中寻找灵感:地方官员由长官开报考语,于是便有了京察考语的出现;咨访之例早以御史巡方的形式在地方施行,抚按之臣上报的官员贤否揭帖与京察访单同样没有本质区别。但从地方借鉴施政经验却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是地方制度中的弊端也一并吸收:如地方官员填注的考语骈四骊六,颇多溢美之词,而京察考语亦然;抚按之臣虽然上呈考察揭帖相对公正,但一人之力难于了解一省或数府之情,难免诉诸风闻,这在京察访单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此外,在一套政令系统中的某些环节出现问题,同样会对其效果造成影响。虽然京察在不断完善中形成制度,但京察访单却未被定为令甲,因此每逢京察,有建议不必发单咨访之臣,如前述邹元标言“遇京察年份,不必发单咨访”;亦有建议将访单内容进行调整之人,如万历三十九年京察,“给事中王某教太宰访单当列四款:云淮上之党、东林之党、顾李之党、王元瀚之党,令人填注,太宰行其说”^⑥。正是因为没有形成制度,才导致众说纷纭;也正因未形成制度,所以既对官员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也容易导致诸如人情等因素对行政效果造成影响。所以不论访单或考语,都在人情因素的影响下趋于式微,可见将希望寄托在官员的集体自觉之上是不现实的,唯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才是保证国家机器有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虽然本文主要论及的是京察访单,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京察之外,访单在明代不同的场合被反复使

用:若有朝政大事需要进行廷议,或有朝中大员需经会推,时常先发放访单征求朝中主要官员意见;而针对知县、推官所行的考选科道,也屡有访单的使用记录。对于名列访单一事,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如王世懋给友人的书信中言“昨驻汀郡,睹考选访单,见尊名衰然,则不胜喜悦。”^⑦在科道考选之中被列入访单,会被视为升迁有望,而满怀欣喜;而一旦名列京察访单,则会引起当事人的恐慌,因为这意味着免官的可能。总之,访单是明代不少行政决策中的重要一环,若能对宏观政治运行中的微观环节进行细致研究,将有利于在生硬的制度条文之外,发现政治制度运行的真实轨迹。

注释

- ①④②汤兆京《灵萱阁集》卷二《条陈内计事宜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02页。
- ②王天有认为“访单由考功司密托吏科都给事和河南道掌道御史发给有关官员,由他们秘密举报。”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 ③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9页。
- ⑤⑤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八《再覆前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40页。
- ⑥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七《周津》,《续修四库全书》第534册《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 ⑦李默《吏部职掌》《考功二·京官考察》,《续修四库全书》第258册《史部·职官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 ⑧⑩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八《覆吴给事访册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39页。
- ⑨吴鸿功《京察访册独遗铨司乞添正疏》,吴亮辑《万历疏钞》卷二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18页。
- ⑪曹于汴《考察国典攸关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435册《史部·杂史类》,齐鲁书社,1996年,第258页。
- ⑫汤兆京《灵萱堂集》卷二《直陈咨访陈规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14页。
- ⑬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八《覆京察拾遗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44页。
- ⑭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二《再申魏进忠郭巩交通疏》,《续修四库全书》第492册《史部·诏令奏议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 ⑮⑯汤兆京《灵萱阁集》卷二《送单始末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507页。
- ⑰孙丕扬《倡官要挟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35册《史部·杂史类》,齐鲁书社,1996年,第278页。
- ⑱蒋科《申明考察事宜疏》,朱吾弼等辑《皇明留台奏议》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54页。
- ⑲王绍徽《京察届期敬陈未议以佐大典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一,齐鲁书社,1996年,第203页。又徐绍吉《京察近迹疏》亦谓“京察、外察时曾有粘无名揭帖于科道私寓,职得之即焚之。”可见科道官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也是按此规定来操作。见同书卷一,第201页。
- ⑳汤

兆京《灵萱阁集》卷二《题科臣议察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515 页。②徐兆魁《揭支吾释辩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三，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36 页。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考察访单》，中华书局，1989 年，第 301 页。④金明时《险臣贪肆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一，齐鲁书社，1996 年，第 237 页。汤兆京亦谓“臣于去年九月到京，十月即行发单咨访。”见汤兆京《灵萱堂集》卷二《送单始末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507 页。⑤汤兆京《昨见徐海石一揭》，《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三，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35 页。⑥汤兆京《灵萱阁集》卷三《题诸臣议察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524 页。⑦汤兆京《灵萱阁集》卷二《参邪臣阻挠察典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508 页。⑧曹于汴《考察国典攸关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258 页。⑨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6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72—73 页。⑩王图《乞恩怜放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270 页。⑪徐兆魁《部臣借事发端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始末》卷三，齐鲁书社，1996 年，第 322 页。⑫杨时乔《钦奉圣谕恭陈下悃疏》，《万历疏钞》卷二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9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221 页。⑬⑭汤兆京《灵萱阁集》卷二《科臣议察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98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510 页。⑮陆光祖《计吏届期敬陈陈治要务以重大典疏》，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七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600 册《集部·总集类》，齐鲁书社，1996 年，第 602 页。⑯郭谏臣《应诏条陈铨曹事宜疏》，《鯤溟先生诗集（附奏疏）》，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⑰申时行《万历会典》，中华书局，1989 年，第 80 页。另据万历初年吏部尚书张翰自称，于京察中查取考语之例是由他提准议行，然未尝明载于何年题奏，见张翰《松窗梦语》卷八《铨部记》，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48 页。⑱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五《内察查取各衙门官员

贤否劄河南道及案令经历司行贵州道造揭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74 册，齐鲁书社，2001 年，第 296 页。⑲史朝铉《陈末议以裨考察以励庶官疏》，《万历疏钞》卷二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9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213 页。⑳温纯《温恭毅集》卷六《恳请圣恩怜允休致以便生还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8 册《集部·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535 页。㉑文秉《定陵注略》卷三《癸巳大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648 页。㉒陆光祖《计吏届期敬陈陈治要务以重大典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七四，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七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1600 册《集部·总集类》，齐鲁书社，1996 年，第 602 页。㉓史朝铉《陈末议以裨考察以励庶官疏》，《万历疏钞》卷二二，《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9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213 页。㉔毛堪《台中疏略》卷四《京察条陈疏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57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654 页。㉕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一《考察》，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第 30 册，明文书局，1981 年，第 353 页。㉖㉗陈有年《陈恭介公文集》卷四《南院掾吏部司官疏》，《续修四库全书》第 1352 册《集部·别集类》，齐鲁书社，1996 年，第 670 页。㉘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卷一《陈言时政边备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28 册《史部·诏令奏议类》，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561 页。㉙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八《拾遗回话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68 册，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545 页。㉚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敷陈吏治民瘼事宜疏》，《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23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302 页。㉛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㉜叶向高《蓬编》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第 25 册，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 470 页。㉝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四七《答杨晚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33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680 页。

责任编辑：王 轲